

晚清浙闽赣三省跨区域慈善网络的 形成与米谷市场

——基于地方文献的考察*

徐 伟

提 要：太平天国战争后建立的江山善堂，是一个在省际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并由边缘向传统城市中心辐射的善堂类型。其发展可以分为延喘局和同善局两个阶段，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各地区善堂分别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在救济过程中彼此合作，逐步形成一个浙闽赣三省跨区域慈善网络。江山善堂的文献中详细登载有跨省份劝捐、各地区同善局组织人员名单以及米谷的采办、中转、运输等内容，表现出施善与教化之外，慈善与市场之间的紧密联系。善堂事业的发展与组织人员的往来，也为省际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地域交流提供一个观察视角。

关键词：晚清 江山善堂 跨区域慈善网络 米谷市场

晚清，位于浙闽赣交界处的江山县经历太平天国战争，人口损失严重，田地大多抛荒，当地士绅先后设立延喘局、同善局，以救济民众、恢复地方经济。学界对善会善堂的研究颇丰，夫马进、罗威廉、萧邦奇等学者认为善会善堂一般出现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在边缘地区的乡村却很薄弱^①，梁其姿还指出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的发展一直停留在教化社会上，并没有转到经济层面。^②实际上，江山善堂初设便在乡村，其主要活动范围在浙西南、赣东、闽北等区域，均非经济发达的核心区，它打破省县行政区划与城乡的限制，逐步形成一个浙闽赣三省跨区域的慈善网络，而且善堂文献和地方志中详细记载该善堂成员劝捐、采办、中转、运输米谷等内容，呈现出这个跨区域善堂组织与市场的密切关系。这与以往研究的善堂有着明显的区别，让我们有机会反思善堂的慈善活动是否只停留在施善与教化，还是背后隐藏着经济层面的深意？本文拟解析清末不同县份省份通过慈善组织在社会救济和地方恢复中的协调合作来回答上述问题。

一 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晚清时期，江山等地在太平天国战争后，在乡村设立善堂以赈饥民众，与以往在城市设立善堂的做法有所区别，可能与乡村受灾程度、米谷采办地点、运输距离和仓储位置等因素有关。这些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促进受灾地之间的联结和跨区域慈善网络的形成。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浙江鱼鳞册的搜集、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17ZDA187）、浙江省哲社科青年重点课题“明清至民国钱塘江河口北岸的潮水、沙地与区域社会研究”（24NDQN11Z）阶段性成果。

① 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55—162页；〔美〕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6—140页；〔美〕萧邦奇著，徐立望、杨涛羽译：《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8—56页。

② 参见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39—253页。

（一）延喘局的设立与发展

江山处于浙闽赣三省交界的边缘地带^①，也是太平天国进入三省的重要战略据点。咸丰八年（1858），太平军进至江山，并由江山进攻衢州、龙游等地，后失利又退至江山，屯聚于石门、花园岗，盘桓三月之久，各乡被灾严重，而且战后“米尤胜贵，较之数十里外，价辄千钱有奇……常平义仓，俱无积蓄”^②，仓储系统亦遭到破坏。

江山被平复后，面对战后社会救济和地方恢复的问题，江山民间自发组织延喘局，并发布《宏教真君劝捐赈饥引》等告示，以“行善事得好报”的理念，号召江山周边地区民众不分地域界限，踊跃捐输。^③在这样的思想号召下，延喘局于多地筹得资金，“在柘浦，则有周君省斋倡捐千金，并向该省各处吹嘘，计番洋数溢二千有零。丰溪则有王君卓甫不速而来，即诣该地乡劝捐，跋涉往来，不辞劳瘁，计捐钱米……特近省如福建、江苏、安徽等处慷慨捐资，即北至京师、南迄台湾，侨居邻省者，亦复润寡分多，不稍靳吝，并有不待劝而邮寄来局者”^④。

延喘局劝捐所得资金多用于河口镇的米谷采办，在受灾地各乡村的适中处所设分局，“并择该处公正者数人，董司其事”，并在乡村设立义仓。^⑤以往研究认为国家和民间团体大多将粮食储备在城市内，这使得城市成为设立救济机构的主要地方。^⑥然而，延喘局却将仓库也设在乡村中，分别为江西官溪、南峰。这样选择的原因在于救济米谷主要来自江西河口镇，而南峰、官溪也处于各分局的适中位置，“以便各小局就近搬运”^⑦，且救济对象也多是周围乡村中的灾民。

延喘局利用民间信仰的号召力在三省间进行劝捐和导入向善，说明三省间的宗教信仰趋同，这使得三省交界地带的民众具有较高的区域认同，也有利于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其中江山为受灾地，广丰县龙溪村为延喘局所在，浦城、玉山、铅山等县为劝捐地，河口镇为购米地，江西南峰、官溪两处为仓储地，各地区在劝捐、买米、仓储、赈米等环节分工明确，彼此协调合作。随着米价腾贵、疫病盛行等问题日益严重，单纯以民间信仰来赈济的办法有所局限，政府力量开始介入，延喘局也由此发展到官督民办形式的同善局。

（二）官督民办的同善局阶段及其地区辐射

同治元年（1862），左宗棠抚浙后，便指挥湘军展开对浙西地区太平军的行动。^⑧随着衢严等地的逐渐平复，救济范围进一步扩大。11月12日，左宗棠将善堂转移到衢州境内各州县，以便直接救济，并于衢州府设立同善总局，“府县各设一局，名为同善，择廉干绅士董之，并听其分局乡村”^⑨。江山赈济收有成效后，12月，左宗棠便以江山善堂为中心，逐步筹办龙游、桐庐、建德等地的赈饥事宜。从赈灾规划和散赈地区来看，同治年间浙江各地区的赈灾应是一个联

① 参见同治《江山县志》卷2《沿革志·兵防》，“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59册，第282页。

② 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21册，第9427页。

③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第25册，第452—453页。

④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363—364页。

⑤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03—404页。

⑥ 参见〔法〕魏丕信著，徐建青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⑦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360—362页。

⑧ 参见同治《江山县志》卷1《輿地志·疆里》，“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232页。

⑨ 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21册，第9428页。

合性的整体，衢州府开始逐步将江山善堂的模式应用到东乡、桐庐、建德等地，赈济的地域范围进一步扩大。

同治二年（1863）3月，五品教职王钰、六品生员姜桂丛等绅董次第筹办江山周边地域的救灾事宜。首务便是在严州、龙游等散赈地区设立同善局^①，并将所筹米谷分别交给严州和龙游的绅董运到两地赈饥。为扩大慈善服务和赈济范围，他们又联合浦城、广丰等地的同善局劝捐集资，其中浦城绅士甚至“转向建宁各县募捐多资”^②，主动地将邻边县份纳入慈善网络，并将所得之钱交给江山同善局董事前往河镇办米，还雇工前往龙游、汤溪、兰溪等地协助当地同善局收埋尸骸。^③在此过程中，善局与义仓的建立呈现出一种连区化、自主化的特征，进一步扩大省际交流的范围。

官方力量的干预主要体现在经费来源和禁止事项上。其一，经费来源方面，除劝捐外，新增盐茶厘税、船户厘税、祠庙私租等，且劝捐实行功牌奖励制^④；其二，在严禁拐掳、扰索、欺凌、屠宰耕牛等方面，与以往延喘局依靠神明信仰的约束不同，制定相应的法律惩治办法。^⑤延喘局原先采用民间信仰的元素，基本被政府的行政和法律手段所取代，但政府只是以官方的影响力来扩大资金来源和完善救济规程，地方官吏并不直接参与善堂的管理，实际事务的展开和组织的运转仍旧是由原来绅董掌控^⑥，善堂也由民办转为官督民办的机构。在此过程中，各地区善局彼此分工合作，随着救济需求的进一步扩大，浙闽赣三省之间逐渐形成跨区域的慈善网络。

二 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中的米谷市场

实际上，若将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放置到更长的历史时段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它的形成亦受到该区域内原有慈善互助传统和米粮贸易市场的影响，呈现出与米谷采办、解运等市场活动的密切关系。

（一）慈善互助传统的影响

在南宋时期，浙闽赣地区就有米谷往来救济的记录存在。淳熙八年（1181），朱熹任浙东常平茶盐公事，当时浙东地区发生饥荒，朱熹在其所上《衢州赈荒疏》中提到“浙东路赈济赈粜，依湖南、江西米”，以及“遣人散于福建、广东两路沿海去处，招邀米客”^⑦。地域的邻近性和粮食的丰产，使得福建、江西等地成为浙江赈饥米谷的主要来源地，而“招邀米客”亦反映出商人在赈济米谷采办和运输中的作用，以及慈善事业与贸易市场之间的紧密关联。

江山向福建、江西采购赈饥米谷的传统得以延续。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江山饥荒时，江西的广丰、玉山两县纷纷捐资，“江之邻邑广丰、玉山，均以饥资余于江。……城乡诸族好义士，爰倡议设厂平粜。旬日间，远近响应。其资或举族量力输捐，或一族中竟有数家独任。有储

①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28—431页。

②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32—434页。

③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25—427页。

④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11—414页。

⑤ 参见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21册，第9428—9429页。

⑥ 按，王钰、徐元和、周登瀛等同善局组织人员原先均在延喘局的慈善活动中发挥力量。参见同治《江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539—540页；同治《江山县志》卷11《艺文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569—570页。

⑦ 同治《江山县志》卷3《食货·仓储》，“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300—301页。

粟者，即以粟输，无粟者，捐钱向龙游、兰溪、桐庐各邑购买转运”^①。道光十五年（1835），江山亢旱，士绅亦乞余邻封，“往江西各路买米”^②。这说明清前中期江西、福建等地区亦保持着赈济邻省和售运米谷的传统，可能当时尚未形成一个慈善组织，宗族充当慈善事业主持者的角色，其办事人员也都选自各姓族的房长。

同样，福建、江西地区在米谷歉收或短缺时，也仰赖于浙江等地接济。乾隆十六年（1751），铅山饥荒，邑人曾朝澜“入闽买米归散，哺数千人”^③。嘉庆七年（1802），玉山、广丰饥荒时，玉山知县“先谕市店有米罄卖，随劝捐买浙米，设局城隍庙平糶”^④，广丰人俞柄东兄弟亦“出橐金往浦邑运米，减价平糶”^⑤。道光十四年（1834），滕子玉任光泽县时，“悉力赈饥，不足，捐资买米，江西铅山会绝糶，一日所买六百石，米适至，饥民获苏”^⑥。

从南宋至清，浙江、福建、江西等省份就已打破行政区划的隔阂，不但三省民众可以跨区域劝捐善资，而且三省米谷亦可彼此流通，这充分说明浙闽赣三省之间保持着相互赈饥救济的传统，这是促成晚清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各地民众或官府“招邀米客”前往邻省购米的行为，亦显示出三省之间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的米谷贸易市场，可以为各地的慈善事业提供较为稳定的粮食来源。

（二）浙闽赣米谷市场的影响

根据前辈学者研究，早在隋唐时期，朝廷就禁止地方官府闭粿，并鼓励地区间粮食流通，以充分发展社会经济和平定粮价，该举措极大促进江西地区对外的粮食贸易，以及周边区域乃至全国性的商品市场的开拓。^⑦到明清时期，江浙、福建等地歉收都从江西输米，而江西粮食外销有两种方式，即政府行政调拨和民间交易。乾隆、道光年间，清政府更加频繁地运用派官采买的方式从江西运出粮食接济邻省，地方政府也实行禁遏粿、免征米船赋税等政策鼓励米粮外运，民间亦存在长途的米粮贸易和各省交界地区人民的米盐交易。在此基础上，陈支平指出清代粮食运销的发展已经使得江西省与其他地区的区域性分工初步形成。^⑧尤其是，铅山河改道以后，河口镇成为连接信江的重要据点，也成为浙闽赣省际间粮食调剂的重要市场，是粮食的集散地。^⑨丰富的粮食储备和便利的运粮交通，都使河口镇成为衢州赈饥米谷的首要采办地。

在灾荒年间和邻地供给不足的情况下，福建建宁等府在自给有余时，也一直是清代福建及周边省县重要粮食供给地。^⑩清人祝焕坡在《北乡二十一社仓记》中提到“浦城素号产米之区，

① 同治《江山县志》卷11《艺文·文辞》，“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532页。

② 同治《江山县志》卷11《艺文·诗赋》，“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59册，第592页。

③ 同治《铅山县志》卷18《人物·善士》，“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西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5册，第371页。

④ 同治《玉山县志》卷10《杂类》，“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第274号，第1516页。

⑤ 同治《广丰县志》卷8《人物善士·义行附》，“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65号，第1239—1240页。

⑥ 光绪《重纂光泽县志》卷1《时事表》，“中国方志丛书”华南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第221号，第83—84页。

⑦ 参见杨雪云、陈金凤：《唐代江西粮食生产与贸易述论》，《农业考古》2005年第3期。

⑧ 参见陈支平：《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江西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姜海燕：《清代江西的粮食运销》，南昌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

⑨ 参见萧放：《论明清时期河口镇的发展及其特点》，《江西社会科学》1989年第3期。

⑩ 参见〔美〕王业键：《十八世纪福建的粮食供需与粮价分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2期。

在昔承平日久，屡庆丰年，固不止耕三余一，商贾贩运出境，岁不知其几千万石也。兵燹之后，接壤地不免荒芜……盖邑介三省邻封，多仰给于本邑，而本邑多仰给于北乡，岁久相沿”^①。这则材料再次展现出浙闽赣三省之间粮食自由往来的情况，而且同治兵燹之后，浙江龙游的赈饥米谷就采办自姚宅、九牧等乡，“该职员等今在浦辖姚宅、九牧等乡采买谷七百余硕，刻须运赴浙省赈济”^②。

浙江等地绅董前往福建采买米谷，需要先在衢州府取得印信护照，“嗣后浙江采办米硕，以衢州府印信护照为凭”^③。该护照记载米谷采办缘由、采办数额等信息，主要用于跨省区采办运输时的关隘查验，以及米谷送到指定地点后，也需要根据护照所载信息来核查米谷数额，查明无作弊情况后，方可缴销印照。

在运输米谷过程中遇有阻拦、作弊现象时，善堂董事会向浙闽赣交界处枫岭营寻求帮助，并需以善局的图记发票验证身份，以防奸商混淆。^④ 这反映出枫岭营不仅是帮助处理阻滞事宜，其中也包括厘卡关税费用的征收，印信护照是官府以公文形式来确保跨省域的米谷采办和运输，而核查米谷数额的行为，说明该护照可能也具备货运单等商业文书的性质。善堂通过官府派发的运米护照获得一个市场准入的条件，并可在运米过程中得到官府的保护以及免税或减税的权力。

河口镇、浦城分别是江西、福建的重要粮仓，无论是善堂的赈饥粮食还是左宗棠的兵饷大多来自两地。^⑤ 善堂的运转与浙闽赣三省之间的市场有着紧密的关系。可以说，慈善组织实际上并不单纯是施善与教化，同善局通过官府派发的护照具备米谷运输中免税或减税的权力，而且江邑办赈在总局人徐鼎有从商的经历^⑥，虽然其传记并未直接提到他在米谷采办与解运中扮演什么角色，但不能否定的是善堂经营和管理中有部分商人的背景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的运转和活动是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下进行的。

三 善堂组织人员与浙闽赣地域交流

浙闽赣三省跨区域慈善网络的形成，还依赖于善堂组织者等三省交界地区的人员本身就存在的各方面联系，这个旧有的人际、市场网络是省际间慈善活动开展的基础，而善堂的发展也加固了这个网络。

（一）善堂组织人员及其社会网络

地方文献中记载善堂各部门的组织人员，可通过考察他们的具体身份来了解其在善堂活动中的作用，以及他们所开展的慈善活动又如何促进浙闽赣省际间的地域交流。

① 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36《记》，“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7册，第742—743页。

②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40—441页。

③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36—437页。

④ 参见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25册，第447—450页。

⑤ 参见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21册，第9427—9439页。

⑥ 按，徐鼎曾在武林贩煤，咸丰辛酉年（1861）冬，徐鼎弃辍重回江山行善，从壬戌到甲子筹办赈饥，首赈邑之东乡，次赈龙游，次严郡之建德、桐庐诸县，如造桥亭、修崎路、煮粥赈济难民、劝捐拯救溺婴，力所能任者，则仔肩独成之。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3，民国壬申年（1932）刻本，第32册，第110—111页。

浙闽赣三省跨区域慈善活动的组织人员名单^①

职务	人员
江邑办赈在总局人	王钰、王以德、王时森、王佩鑒、陆棻、徐鼎、王宗昶、王治猷、王时发
龙游散赈在总局人	黄凤台、周毓桂、王佩球、胡鹏飞、周麟瑞、余撰、徐楷、叶益安
四方办米人	徐振福、毛必廉、陆暹、王显祥
英溪在局人	金桂芳、徐谦和、郑邦森
收米人	朱德华、赵恭纯、王增贵、王绍猷
押运米人	郑仁霁、詹志顺、徐上坛
桐庐散赈在总局人	王开泰、叶春森、祝道隆、周登瀛、徐元和、孟殿荣、徐钧和、杨堃、邱嘉琦、彭玉麟、朱国曹、郑显熊、郑邦泽、高廷彪、季正锦、王应云
建德散赈在总局人	邱永材、祝聚璋、杨朝组、王泽濡、毛起鹏、叶增辉、王泽贤、叶绍元、叶舒澹、曾宪章、叶树杞
江邑劝捐人	江日曜、王梦熊、周约
浦邑劝捐人	詹贤嗣、徐鸿英、姜桂丛、周礼门、周登衢、全锡金、崔晋升、叶春苞、叶尧陌、姚琼璋、曾龙章、罗锡麟、范春泽、周锦麟、欧阳辉、章阶、叶秉纯、曾徽章、季国括、邱永升、孟福禄、叶朝辉、余鉴麟、孙上求、黄清禄、陈国顺、周绍殷、黄昌期
广邑劝捐人	徐升、徐芝荪、王廷拔、李鸿岚、叶树梧、潘绍祖、韦复元、周远模、周永锡、周绍洛、王肇奎、刘绍燃、潘正光、张光祖、潘绍昌、程问渠、周之翰、周林枝
玉邑劝捐人	徐维基、毛殿邦
河镇办米人	周芹生、吴耀熙、周熙萱、周祥吉
衢城通信局	祝元升、周其保
缮写散赈各项清册	周之幹、陆保武、祝文元、王以均、赵恭申、赵显庸、林文焕

由上表可知，善局组织单位细化，在局人、办米人、收米人、押运人、散赈人、劝捐人、通信局、缮册人都有详细记载。衢州府总局分别在江山、浦城、广丰、玉山、英溪等地设局劝捐，其所得资金交由四方办米人筹措米谷，并分别将米谷运往江山、龙游、建德、桐庐等地赈济。在这个过程中，每项环节都需缮册备查，且需要与总局保持联系，各机构之间彼此分工明确，管理严格。

在绅董姓氏分布中，其中较多者有王姓 19 人、周姓 18 人、叶姓 11 人、徐姓 11 人，这些人员在浙闽赣三省跨区域慈善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双溪徐氏宗谱》清楚记载善堂中部分徐姓组织人员的情况，为接下来的讨论提供一些线索。徐升、徐鼎是徐上理的次子、三子，分别为邑增生、太学生。徐升娶妻杨氏、邵氏，来自南峰和东山头，有 3 子，分别是徐元和、徐

^① 余乾耀：《同善录汇编》，黄灵庚、诸葛慧艳：《衢州文献集成》，第 25 册，第 503—508 页。

志和、徐谦和。^①徐鼎先以士而兼农，后经理商业，以资家计。娶俞氏，出自广丰乌口宅晋益公。^②徐元和，郡廪生，在建德、桐庐二县襄办赈饥，后严郡，旋里以疾，卒于衢城，娶王氏，出自三乡口天瑞公三女。^③徐谦和，筹办江山、龙游、建德、桐庐赈饥，蒙抚宪马新貽奖给七品议叙。^④

经上述发现，衢州府等地善堂的参与者选自品行兼良，且通过科举取得一定身份的人员，继承自原先的延喘局，分布在外劝捐办米者也大多为江山本地人。徐姓人员基本上是同一宗族的，多为父子兄弟的关系。徐升的妻子分别来自江西南峰、东山头，徐鼎的妻子来自江西广丰，徐元和的妻子来自江山三乡口，徐志和的妻子来自江西官溪^⑤，而广丰、南峰、官溪分别是延喘局、储备仓所在，徐姓人员与这些地区的家族有着彼此联姻的情况，而这种姻亲关系可能使得这些人员在浙闽赣三省的慈善活动中获得较大的参与权和地方认同。故而可以说江山等地区的宗族在很大程度上参与到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的活动中。

（二）慈善活动对跨区域社会网络的强化

随着同善局在各地的设立，浙闽赣省际间政治上的联系有所加强。各州县善局在劝捐绅富时，采取功牌奖励制度，“凡捐钱八十千者，给予六品功牌；六十千者，给予七品功牌。四十千者，给予八品功牌；二十千者，给予九品功牌。每捐至百名，即由局禀，先造册转详，专送本部院行轅，立将各等功牌填给。其已捐领六品功牌，愿换捐从九品者，准赴行轅给从九品印收。如现有部照，即发部照”^⑥。六品功牌即可换取从九品印，这为各地区绅富提供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

各地区绅富因同善局分工不同，需要书信往返于各省县之间，同时浙闽赣三省内的地方官府在慈善事业的开展上也需要经常沟通。在跨区域的米谷采办和运输过程中，需要衢州府所颁发的印信护照作为购米和关隘的凭证。在运输途中遇到阻扰和抢米事件时，不仅需要寻求各关隘营兵的协助，还需要江山与该地的官员联合理处，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省际间的政治交流。

浙江诸善堂赈灾资金和米谷的筹集多依赖于江西、福建两省。衢州等地善局于广丰、浦城、玉山、铅山等地的劝捐活动，除部分资金用来购置米谷外，其余皆流入衢严等地的慈善组织的运营管理中。可以说，江西、福建两省为浙江地方恢复既提供物资，也提供资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左宗棠也“复筹采买豆谷种籽，购买耕牛，招集邻省农民来浙耕垦”，实行“以商代赈之法，下令收买铜、锡、铁、铅、茶叶，并佣妇女拣茶，而以米给值，以茶济饷”^⑦。招邻省农民来浙垦田，促进省际间人员的流动，而茶和矿产的开采与买卖，促进省际间的商品交易。

江山人周礼门、徐鸿英在来浦城劝捐时，协助当地人管正望、詹贤嗣等建立浦城同善局，并在浦局内担任董事职务，从事宣讲圣谕、义学、育婴等多项慈善活动，“管君等遂退拟义举十条，一讲圣谕，二立义学，三设育婴，四惜字纸，五埋停柩，六置义冢，七施棺木，八修桥路，

① 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0，民国壬申年刻本，第19册，第22页。

② 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0，民国壬申年刻本，第19册，第36页。

③ 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1，民国壬申年刻本，第22册，第16页。

④ 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1，民国壬申年刻本，第22册，第80—81页。

⑤ 参见《双溪徐氏宗谱》卷11，民国壬申年刻本，第22册，第29页。

⑥ 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21册，第9429页。

⑦ 秦细业、陈钟英：《平浙纪略》卷13，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汇编》，第21册，第9429—9430页。

九禁屠牛，十禁毒河”^①。可见，慈善活动已经由赈济灾荒逐渐扩展到地方教育、公共事业等社会治理领域之中。在这样的环境下，浙江善堂的慈善活动和管理模式逐渐被江西、福建等地所接受，促进三省地方治理方式的交流与发展。

在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中，江西、福建分别向衢严诸善堂输入银钱、米谷和垦户等资源，而衢州善堂也为两省慈善事业和基层治理的发展提供经验和人员支持。各地方绅富在慈善事业的开展过程中获得向上流动的渠道，他们以善局、义仓管理者的身份往来交流，是浙闽赣省际间联系的主体，他们在跨区域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扮演着联合作用。浙闽赣跨区域慈善网络的形成与发展，为观察省际间多方面的社会互动情况提供一个良好的视角。

结 语

综合来看，太平天国战争给江山等地造成很大程度上的破坏，但恰恰也是促进江山善堂扩大化发展而非萎缩和破产的动机。^②在战后地方秩序和经济的恢复上，位于浙西南、闽北、赣东区域的江山、浦城、广丰等地反而注意到被灾区之间的联合，并利用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使得浙闽赣三省的边缘区联合成为可能。

尤其重要的是，浙闽赣省际间的民众多有婚姻往来，存在相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原有的慈善互助传统和粮食市场也促使三省边缘区经济被连接在一起，组成地区经济结构^③，最终形成一种经济地理的认同。太平天国战争并未打破这个原有的婚姻、信仰、慈善和经济格局，这是浙闽赣慈善网络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以往地方社会的研究大多受到行政疆域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地方社会或公共事务的活动增添诸如行政区划等界限，但从江山善堂等地方公共事务的实际运行中可以看到，各类地方事务有其基于不同传统和运作模式而产生的网络、区域，需要在研究中对其形态和形成过程分别考察界定。

（作者单位：中国计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翁昭泰：《同善堂记》，光绪《续修浦城县志》卷36《艺文》，“中国地方志集成”福建府县志辑，第7册，第734—735页。

② 参见〔日〕夫马进著，伍跃、杨文信、张学锋译：《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第155—162页；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第239—253页。

③ 参见〔美〕施坚雅著，史建云、徐秀丽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9页。